

近些年来,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备受读者欢迎,苏东坡研究专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继《苏轼十讲》《苏轼苏辙研究》《苏轼评传》之后,再版推出《阅读苏轼》。日前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——

为什么现代人喜欢苏东坡?

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



朱刚

1 如跟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

羊城晚报:您是怎样走上苏轼的研究道路的?

朱刚:我攻读博士学位时,导师王水照教授是研究苏轼的专家,所以接触相关资料比较方便。不过最初我并不做苏轼的专题研究,我的博士课题是“唐宋古文运动”,其代表作就是“唐宋八大家”,苏轼只是其中一家。

羊城晚报:如何评价苏轼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?

朱刚:传统上,我们把“古文运动”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文学运动来看待,但我认为,它实际上也兼具思想史、政治史的意义。在“古文运动”开展的同时,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正在改变其性质,从血统决定的贵族士大夫转变为考试出身的科举士大夫。我是从科举士大夫的崛起、科举士大夫文化的形成,这个角度出发,来构建自己对唐宋文学的阐释框架的,后来就发现,苏轼是这种文化的最好象征:他以读书应举起家,投入政治,成为一个党派的领袖,有能吏之称,同时注释经典、参悟佛道,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家之学,且贯通医学、水利、美食、造园等诸多领域,在文艺上也非全面,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都达到顶尖水准。可以说,他是科举士大夫文化极盛期的一个标志。由此,我的研究兴趣逐渐集中于此。

羊城晚报:在您今年修订重版的《阅读苏轼》一书中,展示了一个怎样的苏轼?

朱刚:在这本书中,我也是以传统中国“士大夫”阶层的变迁为背景,来叙述苏轼生平。此书初版于2011年,当时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书,写“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”,其中关于苏轼的一册,就授命于我。为了不让学生们把苏轼当现代职业作家那样去看,我有意采取了这样的写法。如果读者想了解,什么样的人传统社会中比较理想的士大夫,那就看看苏轼。

羊城晚报:对于您来说,关于苏轼的研究和写作,最大的困难是什么?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
朱刚:苏轼的全面性,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,主要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他不同,难以全方位地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境界。整个研究过程,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,经常望尘莫及。不过有时候在某一点上忽然能跟他共鸣,也喜不自胜。自身有所提高,是最大的收获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苏东坡(苏轼)?

朱刚:对于学者来说,苏轼的好处是喜欢表达、善于表达,他知无不言,有什么想法必须一吐为快,不肯沉默,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,大致都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自述。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,是研究苏轼的知名学者,他有一句读苏感受,就是“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”,你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,他就给你多少回报。

王水照教授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,《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》,他指出苏轼文学的一个特点,就是随时随处、终生延绵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。由于经历复杂,这种人生思考的内容就非常丰富,而读者也容易在人生观的层面被他触动,受他影响。这大概是一般读者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。

羊城晚报:其实苏东坡经历了太多坎坷了,在乌台诗案后甚至有自杀的念头,他也有低落的时候。

朱刚:从作品看,低落情绪是经常出现的。人生难免有失意者,或失意时。古往今来那么多失意的人生,寄情于文学,这才浮起文学这艘大船,不至于沉没。苏轼的仕宦生涯,只有不到十年的顺境,大多数时间担当了异见者和逐臣的角色,所谓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,虽是一句玩笑话,却也是真实的写照。但正是这样坎坷的人生,造就了一位善处逆境东坡居士,我们从他的诗词文章中,可以看到他如何从痛苦中解脱,在各种环境中安身立命。

羊城晚报:苏东坡的人生坎坷主要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?

朱刚:宋代科举士大夫的人生路径,基本上就是这样:早年刻苦学习,钻研经典,了解时务,在出门应举之前,先已形成一套学说,对政治、历史、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的见解,谓之“道”。考上科举后,作为官员,他们崇尚“以道事君”,按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去做,说服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,反对“苟合取容”。此后仕途或顺或逆,那就由遭遇的具体情况决定。当时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,这三个人可以说代表了三种政见,但三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却相当一致,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,是科举士大夫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。就苏轼本人的体会而言,“我本不违世,而世与我殊”,我希望自己有益于世,但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,那就接受命运了,所谓“吾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。在现代民主观念兴起之前,这是最有节操的一种生存方式了。具备这种节操的士大夫,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。苏轼的人生坎坷,具体地说,有时可归因于他的性格,但总体而言,是秉持操守的结果。

羊城晚报:宋代科举士大夫的人生路径,基本上就是这样:早年刻苦学习,钻研经典,了解时务,在出门应举之前,先已形成一套学说,对政治、历史、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的见解,谓之“道”。考上科举后,作为官员,他们崇尚“以道事君”,按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去做,说服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,反对“苟合取容”。此后仕途或顺或逆,那就由遭遇的具体情况决定。当时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,这三个人可以说代表了三种政见,但三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却相当一致,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,是科举士大夫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。就苏轼本人的体会而言,“我本不违世,而世与我殊”,我希望自己有益于世,但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,那就接受命运了,所谓“吾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。在现代民主观念兴起之前,这是最有节操的一种生存方式了。具备这种节操的士大夫,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。苏轼的人生坎坷,具体地说,有时可归因于他的性格,但总体而言,是秉持操守的结果。

羊城晚报:在您今年修订重版的《阅读苏轼》一书中,展示了一个怎样的苏轼?

朱刚:在这本书中,我也是以传统中国“士大夫”阶层的变迁为背景,来叙述苏轼生平。此书初版于2011年,当时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书,写“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”,其中关于苏轼的一册,就授命于我。为了不让学生们把苏轼当现代职业作家那样去看,我有意采取了这样的写法。如果读者想了解,什么样的人传统社会中比较理想的士大夫,那就看看苏轼。

羊城晚报:对于您来说,关于苏轼的研究和写作,最大的困难是什么?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
朱刚:苏轼的全面性,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,主要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他不同,难以全方位地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境界。整个研究过程,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,经常望尘莫及。不过有时候在某一点上忽然能跟他共鸣,也喜不自胜。自身有所提高,是最大的收获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苏东坡(苏轼)?

朱刚:对于学者来说,苏轼的好处是喜欢表达、善于表达,他知无不言,有什么想法必须一吐为快,不肯沉默,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,大致都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自述。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,是研究苏轼的知名学者,他有一句读苏感受,就是“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”,你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,他就给你多少回报。

王水照教授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,《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》,他指出苏轼文学的一个特点,就是随时随处、终生延绵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。由于经历复杂,这种人生思考的内容就非常丰富,而读者也容易在人生观的层面被他触动,受他影响。这大概是一般读者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。

羊城晚报:其实苏东坡经历了太多坎坷了,在乌台诗案后甚至有自杀的念头,他也有低落的时候。

朱刚:从作品看,低落情绪是经常出现的。人生难免有失意者,或失意时。古往今来那么多失意的人生,寄情于文学,这才浮起文学这艘大船,不至于沉没。苏轼的仕宦生涯,只有不到十年的顺境,大多数时间担当了异见者和逐臣的角色,所谓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,虽是一句玩笑话,却也是真实的写照。但正是这样坎坷的人生,造就了一位善处逆境东坡居士,我们从他的诗词文章中,可以看到他如何从痛苦中解脱,在各种环境中安身立命。

羊城晚报:苏东坡的人生坎坷主要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?

朱刚:宋代科举士大夫的人生路径,基本上就是这样:早年刻苦学习,钻研经典,了解时务,在出门应举之前,先已形成一套学说,对政治、历史、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的见解,谓之“道”。考上科举后,作为官员,他们崇尚“以道事君”,按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去做,说服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,反对“苟合取容”。此后仕途或顺或逆,那就由遭遇的具体情况决定。当时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,这三个人可以说代表了三种政见,但三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却相当一致,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,是科举士大夫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。就苏轼本人的体会而言,“我本不违世,而世与我殊”,我希望自己有益于世,但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,那就接受命运了,所谓“吾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。在现代民主观念兴起之前,这是最有节操的一种生存方式了。具备这种节操的士大夫,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。苏轼的人生坎坷,具体地说,有时可归因于他的性格,但总体而言,是秉持操守的结果。

羊城晚报:在您今年修订重版的《阅读苏轼》一书中,展示了一个怎样的苏轼?

朱刚:在这本书中,我也是以传统中国“士大夫”阶层的变迁为背景,来叙述苏轼生平。此书初版于2011年,当时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书,写“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”,其中关于苏轼的一册,就授命于我。为了不让学生们把苏轼当现代职业作家那样去看,我有意采取了这样的写法。如果读者想了解,什么样的人传统社会中比较理想的士大夫,那就看看苏轼。

羊城晚报:对于您来说,关于苏轼的研究和写作,最大的困难是什么?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
朱刚:苏轼的全面性,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,主要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他不同,难以全方位地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境界。整个研究过程,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,经常望尘莫及。不过有时候在某一点上忽然能跟他共鸣,也喜不自胜。自身有所提高,是最大的收获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苏东坡(苏轼)?

朱刚:对于学者来说,苏轼的好处是喜欢表达、善于表达,他知无不言,有什么想法必须一吐为快,不肯沉默,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,大致都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自述。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,是研究苏轼的知名学者,他有一句读苏感受,就是“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”,你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,他就给你多少回报。

3 苏轼的好处是知无不言不肯沉默

羊城晚报:您是怎样走上苏轼的研究道路的?

朱刚:我攻读博士学位时,导师王水照教授是研究苏轼的专家,所以接触相关资料比较方便。不过最初我并不做苏轼的专题研究,我的博士课题是“唐宋古文运动”,其代表作就是“唐宋八大家”,苏轼只是其中一家。

羊城晚报:如何评价苏轼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?

朱刚:传统上,我们把“古文运动”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文学运动来看待,但我认为,它实际上也兼具思想史、政治史的意义。在“古文运动”开展的同时,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正在改变其性质,从血统决定的贵族士大夫转变为考试出身的科举士大夫。我是从科举士大夫的崛起、科举士大夫文化的形成,这个角度出发,来构建自己对唐宋文学的阐释框架的,后来就发现,苏轼是这种文化的最好象征:他以读书应举起家,投入政治,成为一个党派的领袖,有能吏之称,同时注释经典、参悟佛道,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家之学,且贯通医学、水利、美食、造园等诸多领域,在文艺上也非全面,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都达到顶尖水准。可以说,他是科举士大夫文化极盛期的一个标志。由此,我的研究兴趣逐渐集中于此。

羊城晚报:在您今年修订重版的《阅读苏轼》一书中,展示了一个怎样的苏轼?

朱刚:在这本书中,我也是以传统中国“士大夫”阶层的变迁为背景,来叙述苏轼生平。此书初版于2011年,当时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书,写“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”,其中关于苏轼的一册,就授命于我。为了不让学生们把苏轼当现代职业作家那样去看,我有意采取了这样的写法。如果读者想了解,什么样的人传统社会中比较理想的士大夫,那就看看苏轼。

羊城晚报:对于您来说,关于苏轼的研究和写作,最大的困难是什么?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
朱刚:苏轼的全面性,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,主要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他不同,难以全方位地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境界。整个研究过程,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,经常望尘莫及。不过有时候在某一点上忽然能跟他共鸣,也喜不自胜。自身有所提高,是最大的收获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苏东坡(苏轼)?

朱刚:对于学者来说,苏轼的好处是喜欢表达、善于表达,他知无不言,有什么想法必须一吐为快,不肯沉默,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,大致都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自述。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,是研究苏轼的知名学者,他有一句读苏感受,就是“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”,你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,他就给你多少回报。

王水照教授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,《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》,他指出苏轼文学的一个特点,就是随时随处、终生延绵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。由于经历复杂,这种人生思考的内容就非常丰富,而读者也容易在人生观的层面被他触动,受他影响。这大概是一般读者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。

羊城晚报:其实苏东坡经历了太多坎坷了,在乌台诗案后甚至有自杀的念头,他也有低落的时候。

朱刚:从作品看,低落情绪是经常出现的。人生难免有失意者,或失意时。古往今来那么多失意的人生,寄情于文学,这才浮起文学这艘大船,不至于沉没。苏轼的仕宦生涯,只有不到十年的顺境,大多数时间担当了异见者和逐臣的角色,所谓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,虽是一句玩笑话,却也是真实的写照。但正是这样坎坷的人生,造就了一位善处逆境东坡居士,我们从他的诗词文章中,可以看到他如何从痛苦中解脱,在各种环境中安身立命。

羊城晚报:苏东坡的人生坎坷主要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?

朱刚:宋代科举士大夫的人生路径,基本上就是这样:早年刻苦学习,钻研经典,了解时务,在出门应举之前,先已形成一套学说,对政治、历史、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的见解,谓之“道”。考上科举后,作为官员,他们崇尚“以道事君”,按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去做,说服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,反对“苟合取容”。此后仕途或顺或逆,那就由遭遇的具体情况决定。当时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轼,这三个人可以说代表了三种政见,但三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却相当一致,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,是科举士大夫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。就苏轼本人的体会而言,“我本不违世,而世与我殊”,我希望自己有益于世,但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,那就接受命运了,所谓“吾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。在现代民主观念兴起之前,这是最有节操的一种生存方式了。具备这种节操的士大夫,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。苏轼的人生坎坷,具体地说,有时可归因于他的性格,但总体而言,是秉持操守的结果。

羊城晚报:在您今年修订重版的《阅读苏轼》一书中,展示了一个怎样的苏轼?

朱刚:在这本书中,我也是以传统中国“士大夫”阶层的变迁为背景,来叙述苏轼生平。此书初版于2011年,当时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书,写“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”,其中关于苏轼的一册,就授命于我。为了不让学生们把苏轼当现代职业作家那样去看,我有意采取了这样的写法。如果读者想了解,什么样的人传统社会中比较理想的士大夫,那就看看苏轼。

羊城晚报:对于您来说,关于苏轼的研究和写作,最大的困难是什么?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
朱刚:苏轼的全面性,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,主要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他不同,难以全方位地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境界。整个研究过程,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,经常望尘莫及。不过有时候在某一点上忽然能跟他共鸣,也喜不自胜。自身有所提高,是最大的收获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苏东坡(苏轼)?

朱刚:对于学者来说,苏轼的好处是喜欢表达、善于表达,他知无不言,有什么想法必须一吐为快,不肯沉默,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,大致都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自述。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,是研究苏轼的知名学者,他有一句读苏感受,就是“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”,你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,他就给你多少回报。

王水照教授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,《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》,他指出苏轼文学的一个特点,就是随时随处、终生延绵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。由于经历复杂,这种人生思考的内容就非常丰富,而读者也容易在人生观的层面被他触动,受他影响。这大概是一般读者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。

羊城晚报:其实苏东坡经历了太多坎坷了,在乌台诗案后甚至有自杀的念头,他也有低落的时候。

朱刚:从作品看,低落情绪是经常出现的。人生难免有失意者,或失意时。古往今来那么多失意的人生,寄情于文学,这才浮起文学这艘大船,不至于沉没。苏轼的仕宦生涯,只有不到十年的顺境,大多数时间担当了异见者和逐臣的角色,所谓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,虽是一句玩笑话,却也是真实的写照。但正是这样坎坷的人生,造就了一位善处逆境东坡居士,我们从他的诗词文章中,可以看到他如何从痛苦中解脱,在各种环境中安身立命。

4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偏离真实面貌

研究唐诗的学者,经常认为唐人写“友情”比“爱情”重要,对苏轼来说,写他与苏辙的兄弟之情,也远远多于他写的夫妻之情。

羊城晚报:要正确地理解一个古代文人,应该如何进入?

朱刚:就宋代以降的士大夫而言,目前专业学界比较重视对“人际网络”的考察,是传统学术中“交游考”的一种发展。比如要了解苏轼,除了苏轼本人的著作外,也要阅读他周围其他人的著作,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曾巩、刘安世等,在其相互关涉、交错联结的一个“网络”中,比较客观、立体地进行把握。我所写的《阅读苏轼》的生平叙述是比较简略的,但在叙述过程中仍想突出苏轼如何与周围的人沟通;《苏轼十讲》的篇幅比较大,涉及的同时代人物更多一些。我们国家发明印刷术最早,在北宋已迅速普及,留下大量的文集可供阅读。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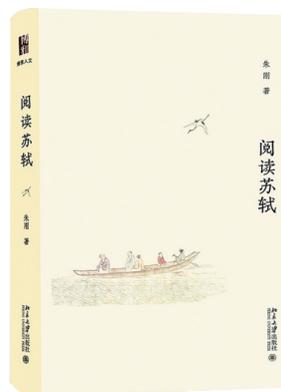
同时代人的文集拼接关联起来,可以复现一段“活的时空”。

羊城晚报:您怎么评价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?

朱刚:在二十世纪的冷战语境里,林语堂把自己的政治立场、文化主张和文艺趣味,无偿“赠予”了苏轼,使苏轼如他所愿,成为一个“自由主义者”。这当然引得许多人对苏轼的好感,也扩大了苏轼的海外影响,但与一位十一世纪的中国士大夫的真实面貌,无疑是有所偏离的。

羊城晚报:现在有很多关于古代人物的传记写作出版,其中有些“戏说”是不是过头了?

朱刚:对于了解汉魏历史的人来说,《三国演义》也是“戏说”,我觉得无妨。虽然逛书店的时候,看到满架“戏说”,或者大其词的“历史”题材书籍,确实有不适之感,但想到不同的书籍拥有不同的读者,也就不十分排斥。无论如何,读书总是“贤于声色狗马”。



阅读苏轼

相当一致,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,是科举士大夫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。就苏轼本人的体会而言,“我本不违世,而世与我殊”,我希望自己有益于世,但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,那就接受命运了,所谓“吾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。在现代民主观念兴起之前,这是最有节操的一种生存方式了。具备这种节操的士大夫,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。苏轼的人生坎坷,具体地说,有时可归因于他的性格,但总体而言,是秉持操守的结果。

同时代人的文集拼接关联起来,可以复现一段“活的时空”。

羊城晚报:您怎么评价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?

朱刚:在二十世纪的冷战语境里,林语堂把自己的政治立场、文化主张和文艺趣味,无偿“赠予”了苏轼,使苏轼如他所愿,成为一个“自由主义者”。这当然引得许多人对苏轼的好感,也扩大了苏轼的海外影响,但与一位十一世纪的中国士大夫的真实面貌,无疑是有所偏离的。

羊城晚报:现在有很多关于古代人物的传记写作出版,其中有些“戏说”是不是过头了?

朱刚:对于了解汉魏历史的人来说,《三国演义》也是“戏说”,我觉得无妨。虽然逛书店的时候,看到满架“戏说”,或者大其词的“历史”题材书籍,确实有不适之感,但想到不同的书籍拥有不同的读者,也就不十分排斥。无论如何,读书总是“贤于声色狗马”。

自序 抱着对“变化”“进步”的信心与期待,这样一种情绪未必经过审慎反思,却已然渗透进了我们的心灵和微细血管中

郭晓蕾

“步步高升”观并非古已有之



现代进步史观是如何在西方语境中形成的?这一问题构成《西方进步叙事的前现代足迹》一书的核心线索。对这一直接事关我们自身且并不新鲜的问题的研究,更多地关注的视野集中于18、19世纪,因为的确是现代进步叙事成形并普及开来的重要时期。

好莱坞电影很热衷讲述这样一种故事:多少身陷困境的主人公遇到了某个人、某些人,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物(不仅是主人公)人生走向的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,最终,主人公因为经历了这一切而对自身和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,甚至修正、提升了自我的道德,周遭世界也多少变得有些不同。

西方影评人喜欢将这种故事概括为“自从你来了”——自从主人公出现,自从人物彼此相遇,破碎的生活开始显露出某种完整性。《闻香识女人》《心灵捕手》《雨人》《死亡诗社》或颇为讲究时尚美感的《穿普拉达的魔鬼》都是在讲述这种故事;即便纪录片式样的竞争题材影片《辛德勒的名单》,其对主人公人生历程的再现亦同样依托于如此的故事模型。这些电影一致诉说着,人生虽充满波折甚至苦难,但我们能够在与世界的遭遇中,不断自我完善,人会进步,历史会因人的努力而步向光明,生活会越来越好。这两年《绿皮书》的火热再次证明了“自从你来了”几乎是好莱坞电影工业永不失效的票房保险箱——个中原因也不复杂,这样的故事表达着现代世界里人们对“变化”普遍持有的期待与信心。

在西方语境中,如此的期待与信心亦并非古已有之。一个醒目的事实是,作为西方虚构叙事起点之一的古希腊并未给历史提供一个“步步高升”的前景:无论是史诗,还是戏剧,它们再展现出的人生、历史都与进步无关。

20世纪中叶以来,对进步史观的反思和批判日渐成为政治正确的话语,但同时,我们还

并未寻得一种能够全面取而代之,并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历史时间的解说;进步史观仍是当今世界最为主流、最具普适效力、最通俗易懂的历史观,且言说着现代人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,这种兑换和嵌入曾被视为“科学的”。现今,各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叙事常被指责为“宏大的”,因为它们企图赋予、强加给各种不同性质的现实以某种统一性;而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,即便客观自然也未必具有完整的同一性,宇宙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并非彼此同调、同构。

因此,《西方进步叙事的前现代足迹》将更着重于探测,看似与“进步”无涉的古典时代与后来的“现代”之间有着怎样的精神关联,尤其是现代进步叙事在还未“祛魅”的“现代之前”有着怎样或隐或显的形成足迹——本书关于18世纪的有限讨论,也意在将侧重点放在钩稽这个时代的精神探索在“推陈出新”的同时,如何继承着“过去”。

大致在基督教于罗马帝国合法化之前的三四百年里,在东亚地中海世界,曾流行着一种与“自从你来了”的故事很类似的叙事。男女主人公相遇后,一系列影响他们人生的事件发生了……但主人公(从外貌到内心)和小说中的客观世界,都不会伴随叙事的展开而发生真实的变化,既不会变得更好,也不会变得更坏。这些叙事在当时被称为“爱情故事”,后来被称为“希腊小说”。

从“文艺复兴”前、后开始,一系列具有“现代”乐观气质的叙事出现了,首先是在神话创作的蓝图中。至17世纪,在《堂·吉珂德》并称为西班牙“黄金世纪”文学双壁的《批判家》中,我们看到了近似于现代性叙事的“自从你来了”的故事:人物在叙事中发生着趋向向善的变化。

希腊小说是典型的“非时间性叙事”(将时间虚构为不变化的历史);而从《批判家》至《威廉·麦斯特》,西方小说中另一重要的叙事范型“时间性叙事”(将时间虚构为变化的、一维的历史)逐渐成形。

微观

受过牛学智批评的学者,是否也有洪子诚的气量呢?

呼唤锐批评

古远清

当我读了牛学智富于代表性的《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》《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》《双重审视》后,感到这是一位有智慧、有个性的批评家,他敢于直指文坛时弊,对创作和批评现状提出不同的观点,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

比如,牛学智承认王德威在现当代研究方面作出贡献,但看不惯有些人将其顶礼膜拜尊为“大师”,不加分析地将王氏所谓“没有晚清,何来五四”“被压抑的现代性”“想象中国的方法”以及“如何现代,怎样文学”“历史与怪兽”当顺口溜移植在自己的论文中。他觉得王德威的理论存在不少盲点,不能挟洋以自重。牛学智在《王德威:通观视野与空间概念批评》的结尾中说:“概括来说,王德威有他不可重复的经验论,这个经验论也已经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。只不过,在他的经验论范围,的确也同时屏蔽了相当多的可提出出来继续研究的价值论问题。这部分地导致他的批评总是缺少必要的现实语境支持,以至于批评者总会从他的身份开始质疑他的批评价值。”

牛学智的论文和专著,其题目和书名均很有理论色彩,但他决不是一位学院派的评论家。他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,并非非常关注当前文学评论的动态,包括理论刊物新出现的现象。他发

并未寻得一种能够全面取而代之,并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历史时间的解说;进步史观仍是当今世界最为主流、最具普适效力、最通俗易懂的历史观,且言说着现代人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,这种兑换和嵌入曾被视为“科学的”。现今,各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叙事常被指责为“宏大的”,因为它们企图赋予、强加给各种不同性质的现实以某种统一性;而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,即便客观自然也未必具有完整的同一性,宇宙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并非彼此同调、同构。

因此,《西方进步叙事的前现代足迹》将更着重于探测,看似与“进步”无涉的古典时代与后来的“现代”之间有着怎样的精神关联,尤其是现代进步叙事在还未“祛魅”的“现代之前”有着怎样或隐或显的形成足迹——本书关于18世纪的有限讨论,也意在将侧重点放在钩稽这个时代的精神探索在“推陈出新”的同时,如何继承着“过去”。

大致在基督教于罗马帝国合法化之前的三四百年里,在东亚地中海世界,曾流行着一种与“自从你来了”的故事很类似的叙事。男女主人公相遇后,一系列影响他们人生的事件发生了……但主人公(从外貌到内心)和小说中的客观世界,都不会伴随叙事的展开而发生真实的变化,既不会变得更好,也不会变得更坏。这些叙事在当时被称为“爱情故事”,后来被称为“希腊小说”。

从“文艺复兴”前、后开始,一系列具有“现代”乐观气质的叙事出现了,首先是在神话创作的蓝图中。至17世纪,在《堂·吉珂德》并称为西班牙“黄金世纪”文学双壁的《批判家》中,我们看到了近似于现代性叙事的“自从你来了”的故事:人物在叙事中发生着趋向向善的变化。

希腊小说是典型的“非时间性叙事”(将时间虚构为不变化的历史);而从《批判家》至《威廉·麦斯特》,西方小说中另一重要的叙事范型“时间性叙事”(将时间虚构为变化的、一维的历史)逐渐成形。

当我读了牛学智富于代表性的《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》《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》《双重审视》后,感到这是一位有智慧、有个性的批评家,他敢于直指文坛时弊,对创作和批评现状提出不同的观点,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

比如,牛学智承认王德威在现当代研究方面作出贡献,但看不惯有些人将其顶礼膜拜尊为“大师”,不加分析地将王氏所谓“没有晚清,何来五四”“被压抑的现代性”“想象中国的方法”以及“如何现代,怎样文学”“历史与怪兽”当顺口溜移植在自己的论文中。他觉得王德威的理论存在不少盲点,不能挟洋以自重。牛学智在《王德威:通观视野与空间概念批评》的结尾中说:“概括来说,王德威有他不可重复的经验论,这个经验论也已经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。只不过,在他的经验论范围,的确也同时屏蔽了相当多的可提出出来继续研究的价值论问题。这部分地导致他的批评总是缺少必要的现实语境支持,以至于批评者总会从他的身份开始质疑他的批评价值。”

牛学智的论文和专著,其题目和书名均很有理论色彩,但他决不是一位学院派的评论家。他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,并非非常关注当前文学评论的动态,包括理论刊物新出现的现象。他发

当我读了牛学智富于代表性的《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》《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》《双重审视》后,感到这是一位有智慧、有个性的批评家,他敢于直指文坛时弊,对创作和批评现状提出不同的观点,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

比如,牛学智承认王德威在现当代研究方面作出贡献,但看不惯有些人将其顶礼膜拜尊为“大师”,不加分析地将王氏所谓“没有晚清,何来五四”“被压抑的现代性”“想象中国的方法”以及“如何现代,怎样文学”“历史与怪兽”当顺口溜移植在自己的论文中。他觉得王德威的理论存在不少盲点,不能挟洋以自重。牛学智在《王德威:通观视野与空间概念批评》的结尾中说:“概括来说,王德威有他不可重复的经验论,这个经验论也已经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。只不过,在他的经验论范围,的确也同时屏蔽了相当多的可提出出来继续研究的价值论问题。这部分地导致他的批评总是缺少必要的现实语境支持,以至于批评者总会从他的身份开始质疑他的批评价值。”

牛学智的论文和专著,其题目和书名均很有理论色彩,但他决不是一位学院派的评论家。他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,并非非常关注当前文学评论的动态,包括理论刊物新出现的现象。他发

当我读了牛学智富于代表性的《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》《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》《双重审视》后,感到这是一位有智慧、有个性的批评家,他敢于直指文坛时弊,对创作和批评现状提出不同的观点,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

比如,牛学智承认王德威在现当代研究方面作出贡献,但看不惯有些人将其顶礼膜拜尊为“大师”,不加分析地将王氏所谓“没有晚清,何来五四”“被压抑的现代性”“想象中国的方法”以及“如何现代,怎样文学”“历史与怪兽”当顺口溜移植在自己的论文中。他觉得王德威的理论存在不少盲点,不能挟洋以自重。牛学智在《王德威:通观视野与空间概念批评》的结尾中说:“概括来说,王德威有他不可重复的经验论,这个经验论也已经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。只不过,在他的经验论范围,的确也同时屏蔽了相当多的可提出出来继续研究的价值论问题。这部分地导致